

耐庵筆刊

陳從周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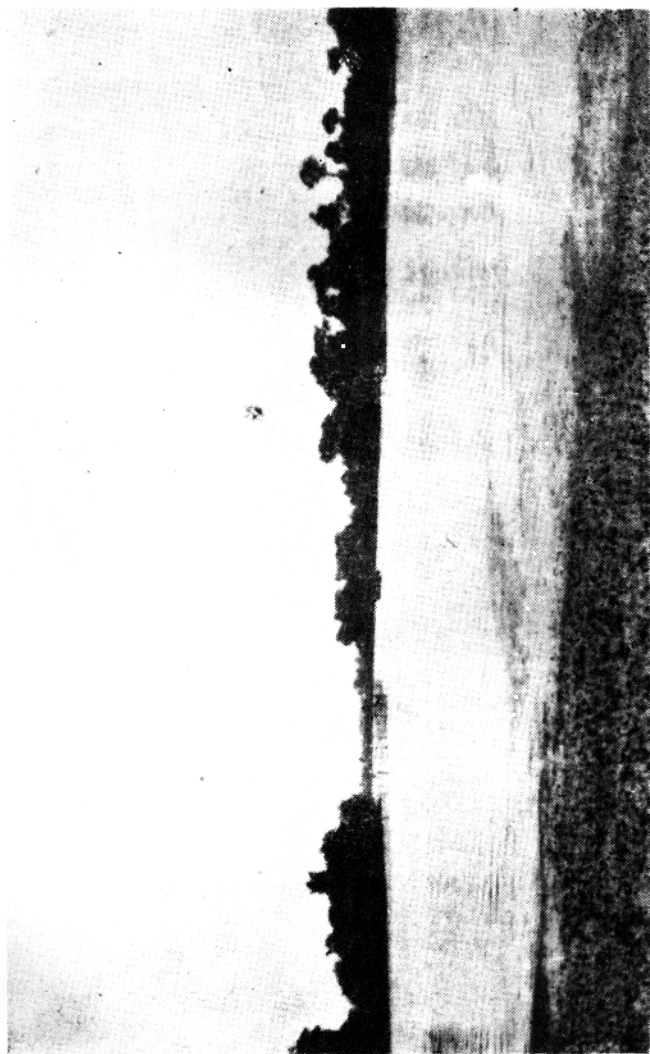
謙淡其用符在
辭不受林冲道

非分三足缺



孫勝從坐第一元勝從坐第三元其義等却扶林冲
請宋杜二頭領領宋杜二頭領來坐那杜廷宋
中低微不若若半低微不若做個人情詩刘唐來第
小五第七位阮五第七位阮小七第八位杜
力第十一位宋貴第十一位梁山泊十一位好漢平
十都來來非學道今日林教頭扶我收一茶之士
依在戰守倫基棚休多有失協
金珠當日當願賞賜重小頭日殺牛宰馬祭祀天地
員聚來下前次西至半交方故欠山是益壽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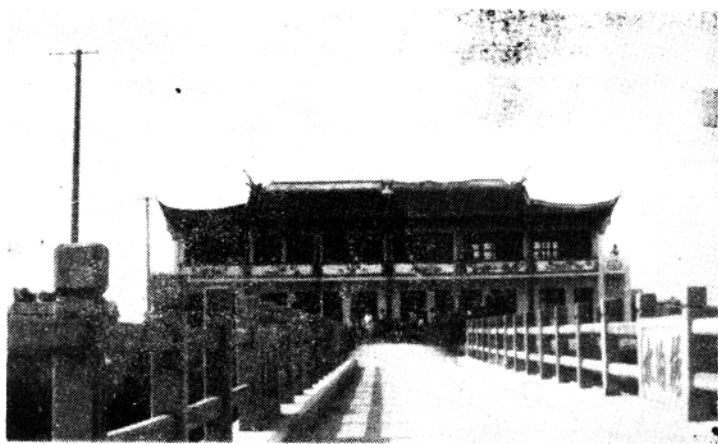




白駒水乡花家塚一角，——施耐庵当年活动处



白驹施耐庵文物陈列室门景



白驹水泊桥与文化中心

大丰县施耐庵研究会

组织名单

顾问

戈宝权	范 宁	冯其庸
朱一玄	徐 放	马蹄疾
刘 冬	陈 辽	张惠仁
喻 蘅	万恒德	姚恩荣

名誉会长

周乃成	周梦庄	柏授方
吴兴鹏		

理事（以姓氏笔划为序）

马 骏	王同书	王树祥
刘兆清	朱子丰	陈远松
施云泽	钱济业	黄同诞
黄骏升	黄兆山	黄远昌
曹凯铎	童 斌	

会 长 刘兆清 干 事 王同书

耐庵学刊 第五期

目 录

大丰县施耐庵研究会组织名单.....

专 论

施彦端即施耐庵考证.....张惠仁(1)

《施耐庵墓志》的辨正及其它.....清 丰(27)

显示施耐庵家世、思想的丰碑

——再论《施廷佐墓志铭》.....王同书(36)

《水浒传》中的扬泰方言.....黄仲实(46)

《水浒》中的吴语方言词语.....杨祖德(58)

从《水浒》语言看作者是苏北人(摘要).....张丙钊(72)

从语言的角度看《水浒》.....胡瑞昌(74)

从《语言》看梅本《水浒》并非现代人伪作.....蒋祖钢(84)

评 述

一份意义特别重大的报告

——读徐放同志《再次调查有关施耐庵历史资料的报

告》.....何 睫(106)

施耐庵与冒致中.....顾光清(114)

从李逵形象看施耐庵的审美理想.....槐 林(121)

资 料

耐庵友朋初探.....童 斌、王同书(134)

施氏宗祠的兴废与修复.....陈远松(146)

资料摘抄(1982年1月5日大丰县委办公室《参阅资料》)(152)

附 录

读者来信.....(71)

简讯.....(154)

稿约.....(154)

施彦端即施耐庵考证

张 惠 仁

江苏兴化、大丰一带施族祖先施彦端到底是不是《水浒》作者施耐庵，目前学术界仍有分歧。《中国社会科学》1982年第6期刘世德同志的《施耐庵文物史料辨析》一文是否定论者之集大成。《复旦学报》1982年5期、《江海学刊》1983年2期和3期、《东岳论丛》1983年3期、《吉林大学学报》1983年6期曾先后分别刊登了章培恒、刘冬、袁世硕、欧阳健诸同志的论文持肯定意见。本文拟结合有关的文物史料，从三个方面谈谈施彦端是否施耐庵的问题，就正于专家学者们。

一、从古人命名、取字、称号的角度

看施彦端即施耐庵

众所周知，古人命名、取字、称号，往往都是有些“说头”的。名、字、号之间，往往在“形”、“音”、“义”、尤其是“义”有某种关联。如李白，字太白；杜牧，字牧之。这是重复同形、同音、同义的“白”字、“牧”字。如诸葛亮，字孔明；陶渊明，字元亮；孟郊，字东野；曾巩，字子

固；班固，字孟坚等等……“亮”与“明”“巩”与“固”、“固”与“坚”、“郊”与“野”都是同义词或近义词。又如罗隐，字昭谏；朱熹，字元晦……等，“隐”与“昭”、“熹”与“晦”则是反义词。还有，辛弃疾，字幼安；晁补之，字无咎。名与字之间是因果关系。而晁补之字无咎，以及郑燮字克柔，又分别源于儒家经典（《易·系辞上》：“无咎者，善补过也。”《书·洪范》：“燮友克柔”）。总之，都有或深或浅、或隐或显的某种关联。浅显者，局外人一望即知；深隐者，若不经一番探考，非当事人往往难知就里。

《礼记·檀弓》上谓：“幼名、冠字。……周道也。”古代男子二十而冠，冠后据幼时所起本名涵义另立别名，叫做字。后来，也有在起本名的同时把字也取好了的。《仪礼·仕冠礼》谓：“冠而字之，敬其名也”，不直呼其名是为了表示尊敬。所以“名”与“字”（包括又字、号等）总有某些关联在。那么，“彦端”与“耐庵”有些什么关联呢？

先看“彦端”的“彦”字。据《说文》：彦作“彥”，美士有文，人所言也。从彡（彡）。厂（厂）声。”而彡，据《说文》：“有或也，从彡，从文。”而彡字，据《说文》：“毛饰画文也，象形。”

上引《说文》，从形、音、义等方面对“彦”字作了解释。“彦”就是“美士”。古代的美男子之所以美，就在有漂亮的毛发。《尔雅释训》谓“美士为彦”、新版《辞源》释“彦”为“才德杰出的人”。由此可见，“彦”字之所以有“美士”、“才德杰出的人”之含义。从字源学上看是与“彡”（毛饰）有关的。让我们再看看“耐庵”的“耐”字

吧。

“耐”，《说文》谓“耐”之古字为“𠩺”，你看，又是从“彡”。“耐”（𠩺）字的右半边正好是“彦”字的下半边。那么“𠩺”是什么意思呢？《说文》谓“耐（𠩺），罪不至髡也。从而，从彡”。而《说文》释“而”（而）为“颊毛也，象毛之形”。你看，整个“耐”（𠩺）字都与毛（须发）有关。那么，“罪不至髡”是什么意思呢？《汉书·高帝纪下》：“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者请之”，颜师古注引应劭曰：“轻罪不至于髡，完其𠩺鬓。故曰𠩺。古耐字从彡，发肤之谓也。”这就是说，“耐”（𠩺）本是古代刑罚的一种。是犯了比髡罪稍轻一点的罪，而还保留着对古代男子来说是一种美的标志的胡须和鬓毛的刑罚。“耐”字之所以有忍受的意义。即由此转化而来。

何满子先生说：“如果他（施彦端——引者注）又叫施耐庵，则耐庵当是他的别号”（《光明日报》1982.7.8）。章培恒教授也有此说（《复旦学报》1982年第6期）。我想，“彦端”与“耐庵”是“本名”与“字”的关系也好，是“字”与“别号”的关系也好，抑或是“字”与“又字”的关系也好，我们可以确认，它俩之间是呈现着一种符合古人起名、取字、称号之时在文字的形、音、义上有着某种密切关系的现象的。而这种现象并不如“亮”“明”“坚”与“固”、“郊”与“野”那样明白浅显，一望即知。（顺便说一下，这种明显的关联，最有利于伪造的——冒认祖先，而又不易被人所揭破；但恐怕也还不是如有的同志所认为的——“他们不管其始祖是张三李四，只要将‘耐庵’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万事大吉”——那样容易搞慕名认祖，“以光门楣

的把戏”。因为你想“贴”是一回事，贴得牢贴不牢又是一回事呢！）而“彦”与“耐”呢，应该说，这比之“明亮”“坚固”“郊野”等等来，是“偏僻”、“深隐”得多了。

那么，我们可以设想一下：天底下会不会有这种巧事：早在元末明初，兴化白驹一带有个叫施彦端的人，他根本未曾取字或别号为“耐庵”，压根儿就不是《水浒》的作者。彦端的某一代子孙，在修家谱时，觉得把《水浒》的作者施耐庵拉来作为自己的祖先可以光耀门楣，于是就在家谱上横添“字耐庵”的字样，而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“施姓”者，恰好在“名”与“字”或“字”与“别号”、“又字”之间有着如此这般的内在关联？（不仅如此，还有施彦端的“会元年兵起，播浙，遂家之”与《水浒》作者“武林施某”、“钱塘施耐庵”在地望上又是恰好相合——这一点下文将作申论）我想，这样天造地设的事恐怕是不存在的吧？对此现象，恐怕只能这样解释吧：在历史事实上，“彦端”与“耐庵”本来就是一个人。“一而二”，“二而一”。换言之，现今兴化、大丰一带的施氏祖先施彦端，他又叫施耐庵，绝非施氏后人所能凭空伪造出来的。绝不是施氏后人随意附会而贴上的标签。

二、从“钱塘施耐庵”“东都施耐庵”

“兴化施耐庵”三者的“统一”看

施耐庵乃江苏人

在讨论了“彦端”与“耐庵”的“挂钩”问题之后，有

必要对“钱塘施耐庵”、“东都施耐庵”、“兴化施耐庵”这个矛盾现象顺带略作一番考察。这不仅是因为牵涉到施耐庵的籍贯问题，而更主要的是因为它牵涉到兴化的施耐庵是否著《水浒》的施耐庵。

在《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》中有这样一段文字：

施公讳翔，字廷佐，□□□□□□。高祖元德于大元□□生曾祖彦端，会元季兵起，播浙，遂家之。及世平，怀故居兴化，遂白驹。生祖以谦，以谦生父景□至宣德十九年辛丑生公。……①

除了开头十三字（包括无法辨认的六字）叙述墓主的名讳以及可能是籍贯之类的内容外，主要提到了包括墓主在内的五代人：高祖元德、曾祖彦端、祖以谦、父景□、墓主廷佐。就其行文来看，提到第二代时，则着墨独多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在墓志铭作者来说，是按照墓志铭这种文体的一般格式——在开头时必须追溯一下所能够知道的若干代祖先的情况，而这里主要是牵涉到籍贯或郡望方面的情况。换言之，是为了交代死者生前的居里（白驹）与其高祖、曾祖的居里（兴化）不同的原因。它告诉我们：死者施廷佐及其父景□、祖以谦都是生于白驹、长于白驹（按白驹距离兴化县邑约一百华里），但他们的祖籍却是在兴化。为了交代为什么是兴化这个问题，所以才有必要在提到第二代时着墨较多。而这个第二代施彦端他又偏偏不是自幼到老蛰居于兴化（如果是这样，行文就用不着那么多笔墨了），而是很长一段时间远离兴化流寓他乡（“播浙”），并在那儿“成家立业”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（遂家之），只是到了朱明开国以后（“及世平”），才又返回到兴化来，然而又没有在兴化继续

住下去，而是进一步迁到远距兴化县邑的滨海之地白驹（“怀故居兴化，遂白驹”）。行文至此，才算交代清楚了墓主施廷佐的生前居里（白驹）与第一代元德、第二代彦端的祖籍（兴化）和第二代彦端曾经有过的迁籍（“浙”）的关系。

这一段文字，对我们今天来说，却为了解施耐庵（彦端）的籍贯、行踪提供了最可靠的原始资料。也可以解释兴化的这个施耐庵为什么也就是著《水浒》的那个“钱塘施耐庵”的问题了。因为他有很长一段时期是在“浙江”（明代曰“浙江行省”；元代曰“江浙行省”）度过的。《施廷佐墓志铭》虽然没有明确写明“播杭”或“播钱塘”，但杭州乃当时（元朝）江浙行省的治所。相对于属淮东道宣慰司扬州路高邮府兴化县的人来说，这是越过了最大的地方行政区域境界，所以必须点明“播浙”，而“浙”之后，没有再指出下一级行政区域，正好反证施耐庵就是在“江浙行省”的治所杭州，因此，他把《水浒》题署为“钱塘施耐庵”（或别人代署），也就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了。

以上说的是“钱塘施耐庵”与“兴化施耐庵”的“矛盾统一”，下面，再看看“东都施耐庵”与“兴化施耐庵”之矛盾是否可以“统一”以及这种“统一”说明了什么问题。

也许有人会首先指出：“所谓‘东都施耐庵’云云，根本就是金圣叹的伪造，这有什么可考证的。是的，有趣的问题正在这里。关于金本《水浒》卷四所录的施耐庵《水浒传序》，一般都判为伪作，因此连同金圣叹所提出的‘东都施耐庵’问题，一概不屑理之。然而，在我看来，事情未必这么简单。此处不拟详论②。仅就这篇‘伪作’所‘捏造’的

“东都施耐庵”恰恰与所谓由“慕名认祖”，搞出来的把戏的“兴化施耐庵”可以统一，换言之，即“兴化施耐庵”的出现正好为“钱塘施耐庵”与“东都施耐庵”起了“搭桥”的作用，我想就这个极其蹊跷的问题谈点看法。

自从明代中叶嘉靖年间，《水浒》以公开出版物流传以来，其作者的题署虽有“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”、“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”或“罗贯中编辑”、“施耐庵编辑”……等等，但在给“施耐庵”三字加上“籍贯”时，都冠以“钱塘”二字。这从嘉靖年间高儒的《百川书志》所著录的直到崇祯年间与金圣叹同时代的“熊飞馆英雄谱本”的题署都是这样。假定这篇“施序”果是金圣叹的伪作，他完全可以人云亦云地题作“钱塘施耐庵”，何必在这种整整一百年间几乎已经成了定论的问题上别生枝节呢？因为按常理，别生枝节是往往容易招人怀疑的。也许有人会说，正因为金圣叹“腰斩”《水浒》，假托古本，本身就是标新立异，所以在题署作者时也要“创新”。可是，我们认为，如果“序文”是伪造的，那么作者的籍贯问题，毕竟与腰斩《水浒》本身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，狡猾的“伪造者”还是没有必要在这种非本质的问题上“创新”，从而可能招来人们更多的怀疑的。而这篇伪“施序”偏偏题作“东都施耐庵”。而一个“伪造者”竟然能在伪造作者的籍贯时，从中国千百个府名县名中挑选出一个“东都”来，而这个“东都”恰恰又为几百年后出土文物以及施氏后裔世代相传的家谱所证实，这岂不成了“奇迹”！难道这是几百年前的金圣叹和施耐庵的后裔通同作弊、上下其手吗？请思考一下这个现象吧：

从出土的《施廷佐墓志铭》来看，施耐庵确是在“元季

兵起”后“播浙，遂家之”的，这与非伪造的“钱塘施耐庵”相符。但从“及世平，怀故居兴化”来看，兴化毕竟是施耐庵的故里啊。那么“兴化”与“东都”有些什么关系呢？据《兴化县志》（嘉靖三十八年胡顺华修，以下简称“胡志”）所载，“兴化，古扬州之域”，不管经历过什么朝代，它的近属关系没有什么变化，它始终隶属于扬州。据《明史·地理志》载：“扬州府：元扬州路，属淮东道宣慰司，……领州三、县七”（按：州三是高邮州、泰州、通州。县七是江都、仪真、泰兴、宝应、兴化、海门）；《明史·地理志》又载：高邮州：元高邮府，领县二（按县二为宝应、兴化）。据此，施耐庵的籍贯，如果是指元代，应写作“淮东道扬州路高邮府兴化县”③；如果是在明代，则应写作“南直隶扬州府高邮州兴化县”。总之，兴化历来隶属于扬州。而扬州历来别名繁多，曰吴州、曰邗州、曰江都、曰广陵、曰南兖州等等。但在五代南唐时，由于“都江宁，称西都”，于是“以吴旧都江都为东都”④众所周知，古人在题署地名时，喜用古称，那么所谓“东都施耐庵”不也正是“兴化施耐庵”吗？也许有人会说，东都也可指洛阳或开封。是的，但是几百年来，却未见这两个更为人们所熟知的“东都”——洛阳或开封有施氏后裔出来“慕名认祖”（“伪造”家谱”、“瞎编”施耐庵著水浒等口头传说），这一现象不也值得令人深思之吗？也许有人还会说，就算兴化向属扬州，扬州古称东都，勉强说得过去，可是金圣叹在伪造时也只蒙对了三分之一呀！殊不知，真正的作者把一篇序言尚且写得那样隐晦、含蓄，故用曲笔，而对一个表示自己“地址”的地名也同样用一个可作多种解释的“古称”不正是作者的良苦用

心吗？

总之，一个伪造者竟能伪造出与三百多年后出土的文物相符合的东西（哪怕是只猜中了“三分之一”！），这难道真是“瞎猫碰到死耗子”吗，而“慕名认祖”的施耐庵后裔竟然出土了一块可以为“钱塘施耐庵”和“东都施耐庵”“搭桥”的《施廷佐墓志铭》，这难道也是历史的“巧合”吗？不，我们正是应该从这种“矛盾的陈述”中，历史的“巧合”中，清理出真正的“历史事实”来。一言以蔽之：“钱塘施耐庵”、“东都施耐庵”、兴化施耐庵”正是“三位一体”呢！

三、“兴化施耐庵”和《水浒》作者 如何进一步“搭桥”？

通过上面两个问题的论证，照理说，《水浒》的作者就是兴化的施耐庵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。但是人们仍然要说：“就算施彦端就是施耐庵吧，滔滔中国，同名同姓者有的是，君不见为《靖康稗史》作序者不也署名‘耐庵’吗？已经有人著文为之与《水浒》作者挂钩了。你叫我相信哪一个？”是的，我国的古籍浩如烟海，如果有人还可以找出“张耐庵”“李耐庵”来与《水浒》作者挂钩搭桥，那也未尝不可以算为一家之言。但我觉得进一步探讨一下兴化施耐庵与《水浒》作者的“搭桥”问题，也是饶有兴味的。但是，这又得从“慕名认祖”说起。

一九八〇出版的戴不凡先生著《小说见闻录》一书说：

“旧社会的某些宗谱，有的就象《红楼梦》里贾雨村和贾政王狗儿和王熙凤家联宗认亲一样荒唐。……由此还可以说连施家有这么一位祖宗的基本事实也是不妨存疑的。”⑤新近黄霖同志的文章也说：“施氏家谱上施耐庵的名字乃如《红楼梦》中王狗儿和王熙凤家联宗认亲一样搞出来的‘以光门楣’的把戏。”⑥是的“中国人是敢于冒认祖宗”的，这的确是中国封建社会曾经有过的一种社会现象。但是，人们的失误或者说在逻辑思维上还不够严密之处，恐怕在于未曾考虑过：“神州何处无施族，唯独此乡认祖宗？！”这个问题。更不用说“水浒从来为禁书，认宗荣辱有还无？”了。

试想想，中国幅员如此之广大，人口如此之众多，姓施者虽不如姓张、姓李这些“大姓”那样遍布全国各地，但也绝不会只是兴化白驹一带所独有。那么，我们就可以从反面加以思考：别的地方的姓施者，为什么不冒认，而偏偏只有兴化白驹一带有人搞此“把戏”？此其一。其二，退一步说，假定兴化白驹的姓施者中曾经有某一个人或某些人，出于某种目的（包括以光门楣）在明清封建社会的时代里竟敢于把被封建统治者明令宣布为“海盗”之“禁书”的《水浒》作者施耐庵冒认为自己的祖先，那么又凭什么力量造出一个“施耐庵墓”和供有施耐庵的神主的“施氏宗祠”来供人们一代一代地给予“春秋二祭”呢？又是凭什么力量“编造”出那么众多的有关施耐庵与张士诚起义有某种瓜葛的经历和他写《水浒》的生动传说，让人们一代一代地相信它们并为之传播开去？其三，为什么在距离兴化三百余里、隔着一长江的江阴一带也曾一代一代地广泛流传着施耐庵写《水浒》的

种种故事传说，而江阴一带并未曾发现有同样冒认祖宗的事实？（须知，江阴也有姓施者）。

或曰：此种反诘不无道理，但重要的是拿出兴化的施耐庵写水浒的证据来。是的，应该有“证据”。但是，如果证据指的就是从地底下发掘出刻有诸如“著水浒者乃兴化之施耐庵也”一类的“过硬”材料的话，那么，本文的写作也就成为多余。然而，我们却可以指出另一方面的“证据”，供人们共同思考、探索。

马克思主义文艺常识告诉我们：“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从何而来的呢？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，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。革命的文艺，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。”⑦《水浒》虽然是在民间传说、话本、杂剧的基础上形成的，但它绝不是随意的“缀合”或一般的编辑，而是在一个统一的艺术构思指导下进行的“再创作”（尤其是前七十回）。高尔基曾经说过：“主题是从作者的经验中产生，由生活暗示给他的一种思想。”⑧毫无疑问，能够创作出一部体现着“乱自上作”、

“官逼民反”的思想内容的作品（哪怕我这里指的仅是前七十回）的作者，其创作的冲动绝不会是仅仅来源于已经过去了的历史事件、传说材料，而必然还有现实生活给予他的“暗示”这个更主要的原因在。而这又往往和作者的生活经历分不开。从出土的《施廷佐墓志铭》我们知道现今兴化白驹一带的施族祖先施彦端——施耐庵，正是生活在“元季兵起”的时代。而这里具体所指的，当是张士诚的起义。这是可以确信无疑的。据《吴王张士诚载纪》记载，张士诚乃白驹场人。（注：白驹距离兴化县邑只有一百华里）于元顺帝

至正十三年（1353年）正月起事，三月“攻陷泰州，杀参知政事赵珪”；同月，“陷兴化，结寨得胜湖”；五月，“破高邮入，遂连兴化攻宝应”；六月，元室“诏淮南平章福寿讨兴化”（重点号为笔者所加）⑨……但是，只经过半年时间，张士诚在解除了元军的威胁后，就于至正十四年（1354年）在高邮建立了政权，国号大周，改元天祐，自称诚王。从以上的史实看，我们说施耐庵“会元季兵起，播浙”，这个“兵起”是指张士诚的“兵起”，人们大概不会提出太大的异议。但是人们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：那么施耐庵对待“兵起”是持什么态度？这就要牵涉到当地世代相传的口头传说了（包括一些被《兴化县续志》（刊行于1943年）收集记录了一些文字材料）。综观到目前为止所能了解到的有关口头传说，对施耐庵与张士诚的关系，大概可概括为两种说法：（一）“却聘”：“与张士诚部将卞元亨相友善，士诚初缮甲兵，闻耐庵名，征聘不至，士诚造其门……耐庵逊谢，……因避去。”⑩（二）“赞助”——在第二种说法中，又有些差别。有的说是自始至终“保”到底；有的说是后因施耐庵主张在苏北一带割据，不主张立即渡江占领苏州并称王。即民间传说所谓“獐（张）不宜上树（苏州）只能在草（草堰，白驹南三十里的地名）里，上树（苏州）即死”因意见不合，即离去。⑪我们认为，曾经参加起义的说法可能性更大。因为“却聘”的说法除见诸《兴化县续志》的所谓“耐庵小史”“施耐庵传”外，“凡是地主阶级出身或受封建影响的知识分子也都这么说”，而“赞助”的说法则是“流传甚广的民间传说”⑫从未见诸文字记载。须知，在旧社会，承认自己